

0100600

F120.2

33

王亚南 著

中国经济原论

•影响新中国经济建设的10本经济学著作•



201006008

中央社会主义学
图书馆
藏书

山东经济出版社

影响新中国经济建设的10本经济学著作

编辑（论证）委员会

主任：刘国光

副主任：张卓元 李本钧

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洛林	厉以宁	丘克军	刘国光	刘诗白
张卓元	谷书堂	何炼成	李本钧	李京文
李晓西	李 翀	吴至强	吴敬琏	陈东琪
陈吉元	陈佳贵	杨圣明	钟阳胜	袁恩桢
黄 达	黄范章	黄德鸿	樊 纲	魏 杰

出版说明

在新旧世纪的交叉点上，我们满怀喜悦与感慨向广大读者郑重推荐“影响新中国经济建设的10本经济学著作”丛书。

追寻新中国半个世纪风风雨雨的脚步，我们不难发现，每一个闪光的足迹，无不同中国经济学家的理论贡献紧密相连；每一段坎坷之路，同样，也都与理论的灰暗、理论的实践程度不足连在一起。正因如此，我们深感，对中国经济学家半个世纪的艰辛探索已经取得的一大批重要理论成果，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在邓小平经济理论指导下，取得的丰硕成果，初步追寻与回顾，遴选出曾对新中国经济建设发挥过重要作用，特别是今后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的优秀经济学著作，编成丛书予以出版；这对于经济学的学科建设和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实践，其意义均是不言而喻的。以上是我们（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广东经济出版社）联合发起开展“影响新中国经济建设的10本经济学著作”论证活动，并出版此丛书的缘由。

为了将这件意义深远的工作做好，我们成立了“影响新中国经济建设的10本经济学著作”论证活动工作小

组，成立了以刘国光（原全国人大常委、中国社科院特邀顾问）为主任委员，张卓元（中国社科院经济所所长）、李本钧（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为副主任委员的论证委员会，组织了全国25名知名学者、专家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数以千计的经济学著作，进行了历时近一年的科学、认真的论证，经过反复的遴选，最后在京召开了“影响新中国经济建设的10本经济学著作”论证会议，经无记名投票，郑重推荐孙冶方《社会主义经济论稿》、马寅初《新人口论》等10本优秀经济学著作。这些著作不仅代表了新中国各个阶段经济学发展的理论水平，更为重要的是，这些著作曾深深影响着共和国的经济建设。其中薛暮桥著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曾三次重版六次印刷，发行量达1000万册，可见该书影响范围之大，程度之深，其学术意义及实践价值显然毋庸置疑。

我们认为，此次具有一定权威性、客观性、科学性的论证活动所隆重推出的“影响新中国经济建设的10本经济学著作”丛书，对于理论部门研究中国经济建设史、研究中国经济学说史；对于经济实践部门掌握中国经济建设规律，把握中国经济发展趋势，科学决策；对于经济类专业学生学习经济学理论，提高经济学素养，均具有重大的参考价值。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广东经济出版社

1998年9月

总 序

为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和广东经济出版社共同发起了推荐对新中国经济建设有较大影响的10本经济学著作论证活动。这一活动是从思想史的角度，回顾新中国近50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国经济学所起过的积极作用；并把其中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推荐给广大读者。这个工作是十分有意义的，也是十分艰巨的。在成千上万本著作中，推荐10本书，不能不说是挂一漏万的选择。所以，这次推荐论证活动，只能叫做第一次，以后还应有第二次、第三次，逐步把多数好的经济学著作都推荐给广大读者。这个“第一次”的推荐论证活动，是由在京的许多专家反复商量，先后提出了83本和52本备选书目；并由全国25名专家学者组成了论证评选委员会，通过认真讨论，最后投票选出了以下10本经济学著作：

1. 孙冶方：《社会主义经济论稿》；
2. 马寅初：《新人口论》；
3. 薛暮桥：《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
4. 于光远：《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
5. 王亚南：《中国经济原论》（又名《中国半封建半

殖民地经济研究》)；

6. 卓炯：《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

7. 蒋一苇：《论社会主义的企业模式》；

8. 刘国光：《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模式研究》；

9. 厉以宁：《非均衡的中国》；

10. 吴敬琏 刘吉瑞：《论竞争性市场体制》。

这10本著作本身体现了中国经济学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发展，以及在改革和建设的过程中，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当然，有的著作是80年代以前写的，所讲的内容，似乎离我们当前体制改革的话题较远。但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不是虚无主义者，中国近50年的历史，是我们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今天的经济理论，也是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这类著作虽然已不完全是今天的话题，确也不可否认她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曾起过的积极作用。同时，当人们仔细阅读这些著作以后，也会体会到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市场经济理论、改革潮流来之不易，我们更应珍惜她，发展她。

另外，由于经济理论的繁荣，好的经济学著作也数不胜数。这里所推荐的10本著作，她们的长处、短处，在经济思想史中的地位到底如何，也希望广大读者进行评议。

刘国光

1998年8月

日译本序言

—

这部书的主要目的，是企图把帝国主义支配下的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整体作为对象，来揭露其内部的矛盾及其向着毁灭之路迈进的辩证发展规律。临到解放的前夜，作为帝国主义及买办官僚统治的基地的农村，已经依着那种辩证发展规律，演成了全面崩溃的残局。

中国新政权成立之始，即没收买办官僚资本归国家所有，没收封建地主土地归农民所有，而合法的私人商工业，则受到保护。新的经济条件和环境，使原来存在并作用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情况下的诸般倾向和规律，完全归于无效了。结局在这种限度内，《中国经济原论》这种性质的著作，就好像要成为旧时买办封建经济的“殉葬品”，虽然它在旧经济的研究上，在新旧经济思想斗争过程的钻研上，乃至在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经济相结合的方法论上，还具有一定的历史的现实的意义。

二

值得提到的是，这部书在写作过程中，是多少受了日本经济学界，特别是受了日本在第二次大战前，由劳农派与讲座派展开的关于日本资本主义性质论战的影响的，现在它获得了被介绍到日本的光荣，那除了增益我们两国文化交流的意义外，对于日本人民大众脱出当前被奴役的处境，也许多少可以提供有益于革命实践的若干看法。

第一，旧中国经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特点，是从它被帝国主义势力侵入的那天起，就逐渐形成的。帝国主义通过中国的封建买办官僚统治支配了控制了社会政治经济活动的主要方面和主要过程，很快就把原有那些不利于它的因素，如有碍制品畅销的旧式手工业，家庭副业等，给排除分解掉，而使那些有利于它的因素，如供给原料半制品的旧型生产作业，旧的采购组织乃至旧金融机构，给改装变形地保留下来。就因为这个缘故，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特殊社会经济形态才能形成，它的特殊运动规律才能为我们所研究和把握。然而，

第二，正由于各色帝国主义者是通过中国的封建买办官僚对中国人民大众行使间接的统治，并且所有这些国内国外的统治阶层，又基本上只是靠着农村的封建榨取作为其寄生的营养。结局，存在于这种社会经济形态下的任何具有现代组织规模的商工业乃至金融业，都变质为带有前资本主义社会性质的东西，如其我们理解到：哪怕是同样规模的小生产组织或商业组织，在一个典型资本主义国家，那就比之在一个封建国家，带有更大资本主义性格，反过来，则又会带有更大的前资本主义的性格。在我们

原来的旧经济中，谁也承认有一些新的工业商业和金融业，但根据我们的经验和我在本书中的分析，它们都分别改形变质地打上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烙印。马克思主义教导我们：一个社会经济形态里面的各种经济范畴，只显示为是它那个整体中的各个别侧面。

第三，为了更好认识那个社会经济形态的特质，从历史上去探究那各个别经济范畴的面貌，原不是没有益处，如大革命后的中国社会史论战，曾大有助于此后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但如没有好好把握着当前的现实的社会经济主体来探究其各别构成部门在那里面所显示的作用，而用过多的时间，纠缠在它原来的历史性格的究明上，那就显得不很实际，而且距离原来希望从历史上来探究我们当前社会性质的意图，就太远了。在过去，我们确曾走过这样的弯路，离开当面帝国主义统治我们的现实，离开整个封建农村破产的现实，而在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特殊制以及小农经济等等方面的断断争论，费去了太多的时间，我的意思是说，如其帝国主义通过封建买办官僚来统治我们既已成为不可争辩的事实，我们就不妨多注意那种经济形态下的各种政治经济组织必然会发生的作用，而毋庸太斤斤于其历史性格可能引起的变化。这教训，也许有所益助于我们日本人民大众的思想斗争任务罢。

三

第二次大战后的日本，变化是太多也太大了。由一向在饥饿死亡线上挣扎的农村底层到神圣不可侵犯的天皇，都在不稳定的状态中。几年大战的疮伤和战后殖民地及海外可以直接间接控制

的市场及原料供给地的丧失，把日本资本主义先天不足的性格，更加赤裸裸地暴露无遗了。劳动大众进一步陷在水深火热中；中小有产者连同自由职业的知识阶层都在惶惶不可终日的没落的命运前战栗；即使是独占的大资产阶级吧，虽然他们对于抓紧机会，医补疮伤，并未表示消极，但大势所趋，总会感到躺在火山顶上，究不怎么安逸啊！一句话，被统治者不能按照原来的方式生活下去，统治者也就不能按照原来的方式统治下去。这就是全面的深刻的延续的总危机。

“怎么办？”“往哪里去？”

对于这样的问题，日本人民有一个答案，日本统治者有另一个答案；人民大众说：“我们不能再继续被磨折，被欺骗，被带上毁灭的道路，踢开那些行使狂妄野蛮统治的混蛋！我们自己来干！”而统治阶级在人民大众势力高涨而同时又有外力可借的时候，总是采取“宁与胡虏，不给家奴”的策略；他们会毫不羞赧地表示：“我们乐意接受美国人的统治，美国人也乐意维护我们的统治。”他们已经用行动这样表示出来了。

这就是今天日本面临着的的最冷酷的现实。它已经由一个不可一世的帝国主义国家，转落成美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或保护国。它的整个社会经济形态问题，要从这里出发来考察。征服者对于被统治国家的原来生产方式是会考虑的，威廉征服者曾考虑原来英国人的生产方式，日耳曼征服者曾考虑罗马人的生产方式，蒙古及清朝征服者曾分别考虑宋明时代的中国生产方式，但所有古今征服者要考虑这种问题，并不是从被统治者的利益出发，而是从他们自己的利益出发，而是从他们要怎样才便于压制，便于奴役，便于搜括，必要时，还便于驱使劳动人民去为他们的利益而战斗出发。日本的天皇制度，日本在长期军国主义教育下培养的国民体格和纪律训练，日本独占资本的军需性格，日本农村的封

建剥削……所有这些因素，美帝国主义都会依照它的统治需要来安排编组在它所希望实现的政治经济形态中。不错，日本曾经是一个有了相当基础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日本人的自尊心，不会容许美国统治者为所欲为地做去，然而，占领制度，军事基地，美日安全条约……不正还在发挥着“鞭子、圈套和绞索”的作用么？

日本经济学界所要研究的日本的社会经济对象，就只能是美国统治者套好缰绳，扬起节鞭所要加速驱策编组成的东西，在目前正在形成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中，凡属过去体现出日本资本主义的落后性那一面的因素，如零碎耕作的封建佃农制，如包含着各种非常残酷剥削惯例的产业劳动条件，如由天皇制引出的一系列政治经济设施……显然都会变本加厉地保留下来，而使那些现代性的社会经济组织，都相应带有前资本主义的性格。

由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变成半封建的保护国，那和由一个封建的落后国家变成半封建的半殖民地，其所经历的过程当然不同，其所表现的内部矛盾发展规律，也当然不能一样。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前者包含有更不自然的更复杂的更强烈得多的内在矛盾；这种矛盾就是在反动的大资本家大地主及贵族官僚军阀一极，更依靠美帝国主义，更加强维持统治的军事政治机构，更法西斯化，更加重对于劳动人民的压迫与剥削；而在被压迫被剥削的劳动人民中下资产者自由职业阶级的一极，则显然要把他们的穷困圈扩大加深。两方面互为因果的作用着，就使这种矛盾发展成自我否定的辩证规律，而在其中所反映的阶级的向背和消长变化状况的说明，就成为现阶段日本民族解放民主革命斗争的理论基础。

四

在中国，现在还不易经常得到日本进步出版界的刊物，从小山弘健氏编著的《日本资本主义论争史》下册中，我翻阅到了书末附载的由1945～1953年的战后论争文献目录，发现关于国家体制问题、农业问题、资本主义性质及其在现阶段的再建问题，幕末—维新史问题以及国家独占资本主义问题等方面，都有许多不同派别不同意见的论著。我没有机会接触到那些论著的原文，从小山氏在那本书里面的概括叙述，不难想见大家都是要为日本当前的厄运，找出一条比较可以行得通的出路。但根据中国在抗战前的论争经验，结合到上面的有关中国在旧社会经济的说明，我想为日本今天的政治经济问题的论争，提出以下几点参考的意见：

（一）日本现正为美帝国主义所统治着奴役着。丢开这个前提事实，任何方面任何性质的讨论，都会不切实际。

（二）在美帝国主义者正还行使统治和奴役的限内，日本原有的社会政治经济组织，不管是“神圣的”天皇制，还是“微贱的”小佃农制；也不管是现代型的大企业，抑还是带有原始性的手工的家内的作业，更不管是从幕末—维新时代就传演下来的老经营，抑还是由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才出现的新组织，都会在不同程度上由征服者统治者美帝国主义加以适合于它的占领和奴役的意图的编组；如其说有什么特殊，那至多也不过是由一个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变成另一个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殖民地保护国的特殊。所以

（三）资本主义再建的问题，农村改革的问题以至天皇制的

存废的问题……等等，都同美帝国主义者对它们所抱的态度或直接间接在何种程度予以利用的打算有关；也就是说，都要同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日本的代理人统治发生密切联系。只有把那些再建，改造或撤除传统障碍问题，当作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傀儡统治的一个具体斗争内容，才有其现实的意义。

（四）对于当前的乃至历史的政治经济问题的研究，显然都是为了更进一步弄明白：在民族解放民主改革斗争中，社会各阶级从它各别不同的经济地位出发，究竟会采取哪种态度。这种“特殊”殖民地社会经济中包含的内部矛盾，究竟会怎样变化，会怎样去影响哪些阶级的势力的消长及其对于解放改革事业所抱的态度。

五

最后，我得说明，我把我的这种不成熟的意见，附在拙著《中国经济原论》的日译本序言中写出来，是希望借此表达我对于日本人民当前解放事业的极度关怀，同时也企望由此对拙著《中国经济原论》添加一些现实的意义。我相信，日本社会经济学界的大家和朋友们，是一定会原谅我并予以指正的。

1954年1月8日

初版序言

现在拿来与读者见面的这部书——《中国经济原论》，就写作与出版的过程说，都算是相当难产。

1940年我在国立中山大学担任高等经济学这一门课程；顾名思义，当然需要讲得高深一点。我于是选定里嘉图（David Ricardo）所著《经济学与赋税之原理》作为讲授的底本。但一半也许因为同学原来所学基础太差，一半也许因为我自己解说表达的能力不够，我发现同学对于这门课程感到十分有兴趣的并不很多。就在同时，我还担任有中国经济史、经济思想史这两门课程。读中国经济史的是四年级的同学，读高等经济学的亦是四年级的同学。就我平日研究的心得讲，我相信我讲里嘉图的经济学说，还应比讲中国经济史有较大的把握，但同学对后者表示的兴趣，却远较前者为大。我当时就感到，这原因，不当完全求之于里嘉图那部大著的难读难讲（以谦虚见称的里嘉图，当他把那部书拿去问世的时候，他竟表示：全英国是不是会有25个人懂得），而更应追问到：中国一般研究经济学的青年学子，在作为一个中国的经济学研究者的限内，他是否有理解这样抽象的理论之必要，或者至少，他们所研究的抽象理论，是否能拿来同现实，特别是中国经济现实发生认识上的关联。由于这一种感想，

我对于中国大学讲坛上，关于经济学以及一切有关经济学课程所采取的教材与教法，就感到大有改革之必要。我当时所写的，而放在本书后面作为附论的“政治经济学在中国”一文，正是那种意念的具体表现。

在1942年，我还是担任高等经济学，还是把里嘉图的经济学作为底本，不过，每讲一章，比如讲价值论或地租论，我就把那一章研究的结论，拿来说明中国的商品价值，中国的地租，如何非里嘉图所研究的范畴，或者，里嘉图所研究的经济范畴，如何可以从反面来证示中国社会经济的非资本主义性。这个讲法，马上使一般同学发生兴趣了。研究经济学或者研究什么经济理论，本来是为了拿来作为理解或研究现实经济的手段，但一般却像行所无事的把这种意思弄错了。

在以后几年——1942年、1943年、1944年中，我不但在讲高等经济学的时候，丢开了里嘉图的那部大著，而直接由一般经济理论，尚论到中国经济，即分别由价值论展开中国商品价值的研究，由利润利息论展开中国利润利息形态的研究，并还把经济学一门功课也担任起来，编出一个站在中国人立场来研究经济学的政治经济学教程纲要，在讲完每一篇每一章的一般经济形态之后，紧接着就讲到中国有关经济形态的相同相异点，以及时下流行的国人有关那种经济形态的不正确认识，并分别予以评正。

本来，在高等经济学讲述的过程中，为了这样的讲法，这样的研究法，是一种新的尝试，需要分别把它撰述出来，就正于海内的高明，所以，本书第二篇以下直至第八篇，曾分别发表于《中山文化季刊》、《广东省银行季刊》、《时代中国》等杂志。在1944年初，承桂林文化供应社主持人万民一、万仲文昆季的友谊与盛意，使这先后依照一定计划写成，但却是分别发表的诸论文，得有集印的机会，于是我曾就中国现代经济的全般发展情

形，及中外学者对于中国经济本身认识的演变情形，写了一篇长达三万多言的绪论，作为第一篇，而全书则题称为《中国经济原论》（以下简称《原论》）。但事不凑巧，《原论》的纸版刚好打成，桂林被日寇侵陷了。在这以后不久，我亦由国立中山大学的所在地广东坪石搬迁到福建来。永安东南出版社计划印行“大学学术丛书”，希望我把原来交给文化供应社印行，但却未出版的这部书稿，拿来再印，我当时曾函文化供应社的负责人商谈，但因交通阻隔，一直没有回响。我当时设想，为了文化的意义，另行在东南印行，一定能邀得朋友的谅解。况该书的纸版是否抢出还有问题，于是我决计整理旧稿，交由东南出版社印行。但在整理的开始，就发现作为绪论的第一篇原稿遗失了；不久，东南出版社突然因为一阵政治风波，把负责人吹得散逸无踪了。我曾一度把整理的工作停止。直等到有志于中国经济之科学研究的朋友们，组织了经济科学出版社，并希望我首先把这部书稿提供出来，我这才重新鼓起勇气，另成第一篇，且在可能范围内，对其他各篇予以部分的增订。

后面增附的五篇，其中，“中国商业资本论”、“中国商业资本与工业资本间的流通问题”，因为可以帮助理解中国资本形态，所以从拙著“中国经济论丛”中移植过来；“政治经济学在中国”、“中国经济学界的奥大利学派经济学”，因为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一般人对中国经济认识的错误，所以也从拙著“经济科学论丛”中移植过来。至《原论》全书所论究的各种经济形态，大体是就私经济立论的，对于有关中国财政方面的情形，没有直接明显述及。这就《原论》所研究的范围来讲，虽不一定是什么缺陷，但探究中国经济运动的整体，显然是不能忽视这方面的直接间接作用的。

本书是尝试把中国经济全体，当作被若干重要经济法则所贯

彻着的统一过程或统一运动。因而，各别经济形态相互间的内在因果关联，是我特别想努力分析的。本书的最后一篇或第八篇，虽是当作结论，当作一切基本法则作用最后必然归结到的后果，但由于资料的不充分和我个人研究能力的限制，我十分坦白的承认，这部书极有限，也许只能算是中国经济之科学的系统的研究之发端。

我深知道：如其是在10年以前，像我这样一部不完备的东西，也许根本就无法产生出来；如其是在10年以后，它的内容和体制，也许会更完备一些。我这样说，显然不是就我个人的造詣立论，而是就我们所在社会的学术界对于中国社会经济形态研究的成果立论。这即是说，这部书稿用我的名义来问世，它实是近十数年来，大家分别由各种不同的视野，对中国社会性质，予以比较深入研究的结果。没有大家已有的这种研究作为基础，我就不但无法采行这样的研究方式，且也不会引起这样来研究中国经济的动机。不过，我这里所谓“大家”，实应包括有有关这方面研究的国外学者，特别是苏联学者和日本学者在内。他们直接间接关于中国现代社会或一般前资本主义社会或残留有浓厚封建因素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成果，实给予了我莫大的激励与启示。

在研究过程中，不时给予我以鼓舞，并使我的研究，不得不继续努力下去的，是国立中山大学经济学系乃至全校有志于中国社会经济之科学研究的同仁与同学。他们每有机会，就提出有关方面的问题来同我商讨，这样，我便经常像是处在被考试者的地位。中国商品与商品价值的研究，刚刚研讨出一个头绪，他们又要求我依此说明中国的货币、资本……等等。不管我的考试是否及格，而我像经常地被安置在被考试者地位却是一个事实。我在这当中，才比较理解到所谓“教育者在不断被教育”的意义。

就个别给予我的帮助的朋友讲，中山大学法学院现任院长胡